

論 点 摘 編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张兴茂在《平顶山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现代西方的生态学思想、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在后现代思想平台上内在整合起来,试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苏联的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作为“世界性的大学问”而被夸耀一时。对我们来说,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别样想象与理论设计,究竟是对它的积极捍卫、全面开敞抑或“跪着造反”、严重遮蔽,是对它的替代选择、创新超越抑或改旗易帜、根本拒斥?现代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源性的制度关联抑或只是现代性思想的必然结果,通过多元文化嵌入和广泛的智慧联盟而确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能有机地矫正马克思主义的“反生态性”而获得重构与新生吗?“有机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纯粹性的生态体系,而是蕴含着多种复杂性语义的政治图谋,它究竟是否算得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还悬而未决,更遑论能指望它见重于时代并开辟未来了。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

袁勇在《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是维护我国法制和政令统一的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尚未分清该审查的准确对象,更未厘定界分对象必需的基础理论。根据规范概念论与言语行为论,该类审查的准确对象并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而是由语义和语力结合成的语用学规范的合法性。语用维度内的规范合法性审查对象是被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以及生

成被审查文件效力的制规行为要件的合法性。前者包含规范的适用条件、规范模式及规范内容的合法性,后者包括制规主体资格、制规意图表示、制规实体行为前件及制规程序的合法性。因制规行为的合法性单向决定制规结果的合法性,法院等审查机关应当既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又审查制规行为各要件的合法性,否则将得不出完整的审查结论。

区块链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胡光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作为前沿科技的代表,区块链技术的价值逐步凸显。面对竞争激烈、快速增长的市场,如何获得知识产权,以便应对未来该领域的激烈竞争对于如软件开发人员、公司等市场主体等利益相关者来说至关重要。在既有的知识产权法架构内,通过使用专利、版权、商标等方法对该创新技术进行保护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例如软件的可专利性、程序或数据库版权独创性判定、商标构成要素的描述等。只有在深入了解所涉规范性判定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既有判例、实务经验和技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保护目的的达成。

新型人格财产权确立及制度构造

郭少飞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在主体客体化趋势之下,人格财产化向各种人格要素拓展深化,人格财产利益类型、价值剧增,对其保护的制度需求愈发强烈,而现有理论学说及制度供给有所不备,应创立新型人格财产权。人格财产权独立于保护精神利益的人格权,分为具体人格财产权与一般人格财产权。前者

指向特定人格要素财产利益,后者针对具体人格要素以外、归属于抽象人格之人格财产利益,二者共同构成人格财产权利体系。人格财产权主体以自然人为主,也包括部分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客体系姓名、肖像等标表型人格要素,隐私、名誉、荣誉等精神型人格要素,个人信息,有限度之身体等;在权限上,可自由处分,能转让,得许可,可继承,但受限于人格权、公序良俗及言论自由。

临空经济对区域发展的重构效应

汤凯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发展临空经济是基于中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必然选择,能推动区域产业与技术升级,并通过连通全球的航空运输网络压缩区域间时空距离、重塑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基于中国35个枢纽机场及其所在空港城市的实证分析发现:临空经济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促进区域服务业发展,但对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并不显著;能通过缩短全国空港城市间时空距离产生空间重构效应,效应大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故各区域应强化临空经济战略地位,协调临空经济区空间分布,机场布局更多向中西部倾斜,并因地制宜地构建临空产业体系,推动“港—产—城—域”四位一体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

陈彪,卢珊在《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按照新创企业的特点和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可以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均会积极影响新创企业产品的创新战略;不良竞争对市场不确定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企业年龄对市场不确定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技术不确定性的负向作用不显著。因此,完善制度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是促进新创企业采取产品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应该进一步改善企业的创业环境,为新创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P2P平台下农村供应链融资的风险控制策略

刘超,朱高宏,康艳青在《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农村供应链融资是P2P平台服务农村金融的新型模式,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借款农户、核心企业与P2P平台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融资主体间的行为策略彼此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决策同时受到其他两方制约;控制融资额度、降低违约获取的超额收益能够有效降低融资风险;融资审核、监管成本对于核心企业与P2P平台的策略选择具有较大影响;违约成本、正向激励机制及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能够有效制约融资不良行为发生。基于此,第一,加强对项目的审核,控制融资额度,降低借款农户违约获取的超额收益。第二,注重前馈控制和正向激励机制,加强对核心企业的审核管控,提升核心企业监督的主动性。第三,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大违约成本及处罚力度。第四,通过新兴技术使用及业务模式创新,降低审核及监管成本。

小农户社会网络对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

刘依杭在《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完善小农户与农业企业利益联结是顺应乡村振兴战略和寻找新动能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政策创新。小农户社会网络是影响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因素。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互惠度对农业企业经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网络强度的影响最大,网络规模的影响次之,网络互惠度的影响最小。在小农户对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提升与优化中应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在小农户与农业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应注重构建小农户与农业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以利益联结为导向推进农业企业获取更多资源,以提升农业企业的经营能力;二是农业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资源的积累,还应关注对小农户的有效带动,以此增进双方的互信程度,促进小农户与农业企业利益的高效转化,从而促进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优化;三是建立小农户与农业企业稳定的合作关系,激发农业企业与小农

户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新格局,促进小农户和农业企业有机衔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技术理论”问题的生成及论域

张务农在《电化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技术对教学的扰动作为一个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日益凸显,而原有的教育哲学框架已经很难容纳新的内容,因此,有必要构建教育哲学的“技术论”。传统哲学的“偏见”和教育哲学对“技术人”的排斥,是“技术论”没有成为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因;技术哲学进展证成的技术观、人性论,以及教学实践领域的变革、教育哲学本身的功用为教育哲学技术论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辩护;考虑到教学过程的基本构成以及技术智能化对这些方面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教育哲学技术论包括“技术与主体”“技术与知识”“技术与实践”“技术与价值”四方面的论域。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张宝明,李帅在《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中国礼的教化传播思想及当代价值

张兵娟,刘佳静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撰文指出,礼教是关于“礼”的意义传递、思想交流、情感互动的行为规范。礼的教化不仅包含教育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也体现出“传播的仪式观”。礼教传播是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则的建构和实践。教化传播始终强调以“仁”“礼”为本,通过人生之礼、祭祀之礼、生活之礼等传播仪式和形式,意图从个体的自身修养做起,最终达至个体德性与社会道德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礼教传播的当代意义:一是强化伦理道德的“德化”塑造,二是注重人性情感的教化培育,三是追求“知行合一”的践行精神。对于礼教思想,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解读、阐释礼文化中优秀的德育内涵,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新文学时代的建构

李敏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撰文指出,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终结和被“理想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90年代成为需要重新被定义的新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文学期刊积极参与了对这一新文学时代的建构:首先,通过策划“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联网四重奏”等栏目,集结了新的作家队伍;其次,通过对“新生代”作家的命名和阐释,发现了90年代文学的“质的内涵”;再次,通过策划“文体实验室”“凸凹文本”等栏目,试图在90年代生产出一种新的文体。无论是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还是文学期刊直接针对文体的策划,都是对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的再生产。就此而言,90年代文学期刊在建构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同时,也完成了对90年代的“纯文学”观的确认。